

## 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(上)

“我们对党要有信心，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，要为人民谋利益，不谋私利，不私心，立党为公，执政为民。要有公的思想，要切实维护好老百姓的利益。该晒黑的时候就得晒黑，该掉皮的时候就得掉皮，人民群众的事耽搁不起。其实，吃苦也是一种享受。”这是李双成2004年12月10日在闽宁镇党委会上，给班子成员上党课时的讲话。

也就是在这一天，李双成上完党课前往永宁县汇报会议情况，在路途中不幸遭遇交通事故，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，享年51岁。

2005年2月27日，自治区党委作出《关于追授李双成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的决定》，并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要在广大共产党员、干部和群众中深入开展向李双成学习的活动。

李双成，197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2003年3月，任中共永宁县常委、副书记、纪委书记；2004年3月兼任永宁县闽宁镇党委书记；2004年11月任银川市政府研究室（扶贫办）书记、主任。

闽宁镇是移民吊庄乡镇，开发建设期间，由于自然条件差，基础设施刚刚起步，经济发展慢，加之开发建设过程中遗留问题多，债务累累，水利工程设计中拖欠农民工工资无法兑现。移民怨言多，矛盾多，镇领导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要账的人。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，造成干群关系紧张，工作难以开展。许多干部都不愿意来闽宁镇工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永宁县决定由县委常委、纪委书记李双成兼任闽宁镇党委书记。李双成

挑起了这沉甸甸的重担，来闽宁镇解决突出问题。

肝胆相照，一诺千金。2004年3月4日，李双成上任了。在闽宁镇三级干部会议上，他说：“今天给大家服下一颗定心丸，我有决心在闽宁镇任职期间解决好老百姓的事，我会给闽宁镇两万多人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”郑重的承诺道出了闽宁镇两万多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期盼，道出了对闽宁镇人民的责任和担当。

李双成梳理闽宁镇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，带着干部下乡，深入村组农户家中，和老百姓面对面交谈，虚心听取群众意见。他把调查反馈的问题整理成14类100多件，包括土地纠纷、蘑菇温棚户补助款、村干部工资待遇低、三级扬水工程试灌、农户过水桥、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、闽宁镇小学缺少教室、教师等，对这些问题逐一制定措施，分类进行解决。

闽宁镇在开发建设过程中，因水利工程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上百万，致农民工多次群体上访，给闽宁镇造成了不良的影响。李双成积极协调各方争取资金68万元发放到大手中。

李双成足迹踏遍了闽宁镇每一个角落。木兰村二组、三组140亩土地灌不上水，13户人没有路走，李书记解决了老百姓灌水难、行路难的问题。村民感慨地说：“我们遇到了真正为民办事的好书记了”。

一心爱民，热忱为民。李书记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，“我也是农民的儿子，我也受过许多苦，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。”李双成书记深入农

户调查时发现，有几户农民生活特别困难。他自己买来大米、面粉、衣物等送给武河村张明虎、马富兴、李元、马梅等特困户。李书记自己掏100元钱给残疾人王连。他把自己的水壶、暖壶、脸盆、皮鞋、衣服等东西送给武河村困难家庭。调查走访时，李书记来到残疾人王彦刚家，看到他家境贫寒，没有看过电视，给王彦刚家送来了一台18英寸彩电，鼓励他们多看新闻，多学习发家致富的路子。

为了把武河村养殖小区的养殖业发展起来，李双成书记争取到了一笔帮扶经费，给武河村养殖小区50户人家，每户扶持2只羊，共100只。

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李双成知道闽宁镇有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，他赴杭州学习考察期间，与温州电子厂、美的服装厂、浙江绿地物业管理公司等处取得联系，共输出劳动力82人。全镇共输出劳动力4000余人，向杭州、北京、内蒙古等外省区输出劳动力450余人。当年劳务输出累计创收808万元，切实增加了农民收入。

闽宁镇的教育工作落后，基础设施差，缺教室、缺桌椅、缺教材、缺教师。李书记积极争取海尔集团公司助学资金120万元，修建了海尔希望小学、铁东小学、玉海小学，解决了上学难问题。

面对困难学生、残疾学生无法入学的问题，李书记协调相关部门争取资金10.5万元，减免学杂费、书费，并争取35000元，给2004年录取的70名大中专学生每人补助500元学费。

披肝沥胆，鞠躬尽瘁。闽宁镇三

级扬水工程试水期间，由于三级扬水渠道是高垫方，渠道悬在高处。加之渠道是刚修成的新渠道，一旦被水冲开整个渠道就毁于一旦。李双成带领镇村干部，在炎炎烈日下和群众一起在渠道上守候了整整12天。他在17里长的渠道上每天要走三四个来回。

有一天晚上11点多，渠道发生决口，李双成第一个跳进水里搬运土袋抢险，十几个群众拿起铁锹堵住了堤口。三级扬水试灌成功了，老百姓笑了，李书记脸上露出了笑容。清清的渠水哗啦啦地淌进农田里，淌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，滋润了心田，赢得了民心。

临别上党课，情系闽宁镇。闽宁镇第一届二次人代会闭幕了，选举成功了。李双成站了起来，他激动地说：“人代会开得很成功，我非常感谢大家！”他代表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会场上响起一遍又一遍的掌声。

下午李双成组织召开党委会，这是他给闽宁镇党委新班子上的最后一堂党课。李双成说：“作为共产党员，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，要加强作风建设，更要转变思想观念。人民代表这样信任我们，把我们选举成领导，我们不要计较个人得失，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。在任何形势下，要相信党，要依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，在思想上不能有丝毫动摇，对党忠诚，对党要有信心。要求真务实，实事求是，要有吃苦耐劳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。”

（据银川党史网）

## 陕甘宁边区的婚姻立法与实践 (上)

以自愿为原则，实行一夫一妻制；禁止强迫包办，及买卖婚姻。”由此可见，婚姻自由原则主要规制包办和买卖婚姻的陋俗，贯穿于不同时期的婚姻条例，在边区婚姻立法中具有重要地位。

一夫一妻原则。一夫一妻是指夫妻双方不能同时有两个及以上的配偶。1939年《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实行一夫一妻制，禁止纳妾。”1944年《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实行一夫一妻制，禁止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。”1946年通过的《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》第一条规定：“男女婚姻以自愿为原则，实行一夫一妻制。”在一夫一妻原则指导下，“一夫多妻”和“一妻多夫”现象逐渐减少，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也相应减少，社会更趋稳定。

男女平等原则。男女平等是指女性和男性在政治、社会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。具体到婚姻生活，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享有平等的权利，承担平等的义务。1939年《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实行男女平等，提高妇女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社会上

的地位。”1939年和1946年颁布的《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》以及1944年颁布的《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“男女平等”，但是它们都赋予女性提起离婚的权利，推动了边区的妇女解放运动。

## 陕甘宁边区婚姻立法的实践冲突

婚姻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在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的具体实践中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冲突。其中，离婚冲突、新旧婚俗冲突、抗日军人的婚姻冲突较为常见。

离婚冲突。陕甘宁边区的婚姻立法以婚姻自由、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，在赋予女性同等提出离婚权利的同时，也规定了双方可以提起离婚的条件。因此，边区由女性提起的离婚案件不断增加，且以贫农家庭居多。

“根据1944年绥德分区对请求离婚当事人成分的统计，在33件离婚案件中，贫农有25件，中农有5件，工人有2件，富农有1件，地主则没有。”这也造成了边区法院机械按照婚姻自由原则进行判决的结果，引发了群众的不满。对于贫穷家庭而言，离婚还

意味着夫家为娶妻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将付诸东流，因此导致冲突不断。

新旧婚俗冲突。彩礼作为边区盛行的传统婚姻习俗，并没有统一的规格和标准。20世纪40年代，由于性别比例失衡进一步加大、边区通货膨胀等原因，彩礼价格急剧上升。有些女方父母贪图高额彩礼而为女儿订立婚约，这类现象的本质就是买卖婚姻。但在陕甘宁边区的婚姻条例中，买卖婚姻被明令禁止。因此，买卖婚姻与彩礼之间的模糊界线导致在实践中极易引发冲突。

抗日军人的婚姻冲突。在战争不断的环境下，边区军婚有其特殊性。婚姻条例一方面要稳固军心，保证前线抗日军人的积极性；另一方面还要照顾抗日军人的家属，保障其基本生活。但是，由于战争具有风险性，抗日军人何时能够回家并不能确定，部分家属就会选择离婚、另嫁、招夫等。这些方式虽然能够临时解决抗日军人家属的问题，一定程度缓和家庭矛盾，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势必会产生冲突。

（据《人民法院报》）

## 历史上的宁夏毛毯 (二)

时记述道：“裁绒毯，为此前特产，小工厂共20余家。所出物品，如地毯、马褥、台布、椅垫、炕褥子等，绒长花美，胜于包头及新疆之所产。惜均零星织卖，无大宗输出。毯之价格，普通每平方尺约7钱左右。其优劣视之多寡而分，最佳者每平方尺120纬，次100纬，又次80纬。”

1933年，国民政府实业部派员对西北宁夏等地特产进行调查，指出：“织毯业则因宁夏所产之羊毛细软可爱，其制之成品亦较西北各省为佳。”

1934年，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的傅作霖派赴宁夏工作与考察，指出：“宁夏向无机器工业，手工业之最有成绩者为裁绒毛毯，花纹精美，远近驰名，实为本省之特产。”

1934年，张中岳来宁夏进行调查，关于“宁夏出产”，指出：“裁绒毯：系用羊绒线织成，上缀以人物、花卉，并着以各种色彩。每毯一条，可用数十年，已久为中外人士所称道。”

1934年，孙翰文来宁夏调查，指出：“宁夏‘最著为毛毡、花毯出品，颇精致，产额现逐渐增加。花毯以褐色者居多，有粗、细两种，粗者可以御寒，细者中含微孔，犹可祛暑。取价之标准，视纬线之多寡而定，最上者每平方米120纬，次者每平方米七八十纬。……近年输出各地者颇多，将为本省输出品之大宗。”

1934年9月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、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畜牧系主任兼州立农场场长蒋森等来宁夏考察，

来宁夏调查，指出：“宁夏裁绒毯向称著名，各县亦有小规模之毯房，利用当地羊毛织造粗毯，宁夏所产尤佳，织工、染色为西北冠。”

1936年，易海阳来宁夏调查，指出：“宁夏毛毯尤以裁绒毯为佳，图案新颖，织法甚精，每毯可用二三十年之久，尤为人所称道。”

1937年6月，美国记者哈里逊（哈里森·福尔曼）等人在宁夏省城（今银川市）参观考察期间，特前往参观了宁夏地毯织造工厂，并拍摄了极为珍贵的宁夏手工地毯工艺加工过程的照片。

1939年，张君实来宁夏调查，指出：“宁夏‘特产中的裁绒毛毯，因其花纹精美，远近驰名，所以产量也很丰富。……定价的高低，也是看纬线的多寡而决定，最好的每方120纬，次点的每方100纬，再次点的每方80纬等。”

1942年10月，经济部西北工业考察团在宁夏毛织厂考察时，对宁夏毛织品优良颇为赞许，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“特赠送该团团员每人毛毯一条”。

考察团成员、工业经济专家胡元民指出：“（宁夏）以毛纺织工业较为发达，共有6家，而以兴夏织呢厂稍具规模。……每目可产毛毯40条、军毯100条及地毯50平方尺。后者（地毯）系手工出品，精细美观，驰名中外。”

1943年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、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畜牧系主任兼州立农场场长蒋森等来宁夏考察，

认为：“该省生产制作地毡之羊毛最为重要，饲养绵羊之主要为出产制作地毡之毛……出产地毯、毛料及最优质之白色皮袍已著名全国。”其拍摄的“宁夏地毯”照片题注曰：“该省编织的许多地毯质量、设计和颜色都很出色。地毯制作是草原重要的家庭产业，并已在一定程度上商业化。”

1944年7月，农林部宁夏农业调查团团员、农业经济专家董正钧调查指出：“宁夏‘名贵之地毯亦易（贸易）西售欧陆、南销各省及南洋，并易（贸易）跨洋而赴美。”

1947年七八月间，来宁夏主持邮政局工作的郭玉峰指出：“宁夏‘裁绒毯，色泽鲜艳，质料极佳，出品冠于全国。制毯者约120余家，惜均为手工，无机器设备，不能大量制造，洵为遗憾。”

综上所述有关史料记载，宁夏毛毯始名于清乾隆年间，盛名于民国时期，然因手工制作，需时甚久而成本昂贵，故产量有限，供不应求，可谓宁夏珍奇之特产。正如1943年7月，兰州电池厂副主任王维文等来宁夏考察，在参观织毯工厂后，认为：宁夏“主要产品为毛毯及裁绒毯，间及毛织衣料。余等曾经参观，此厂有织毛毯机60架，裁绒工人数十名。毛毯图案、花样繁富，色彩艳丽。裁绒则任何图案均可照样裁制。更有剪花一种，为先裁成平毯，然后用剪依花样剪出，仿佛浮雕，最为优美，不愧名著全国也。”（据《宁夏文史》）

1943年9月，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、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畜牧系主任兼州立农场场长蒋森等来宁夏考察，

移民岁月 第一百零三期  
YI MIN SUI YUE

## 一生追求唯丰产 (一)

许存远 口述

农垦老领导柳登旺开会总爱抬举我，说只要到连湖看到田边有个背着黄书包、卷着裤腿、光着脚、拿着钢卷尺的人，不用问，准是老许。其实学农搞种植的么，不围着田间地头转，那就叫不务正业。

我是河南省清丰县人。1924年1月生人，1948年在河南国立一中毕业，考入了西北农学院农学专业。1952年毕业分配到宁夏，先分到王太堡试验场。当时就有个想法，学农业技术的，适合在农业栽培一线，能发挥自己所学的专长。在科研单位，理论多，实践少，那时农场人员配备、仪器、机械等比农村先进。在农场搞科研、生产、示范、推广一手抓，什么都有。有了新技术，就可以实验、示范，成功了可以马上推广。理论和实践容易结合，所学的专业有用武之地。因此，我愿意到农场，在大田里摸爬滚打。于是就跟另一个同学对调，换到灵武农场。1954年6月，农垦又开辟了新战场，我被调到连湖农场搞规划、筹建工作，成了第一批建设连湖农场的员工之一。

刚去农场，那种荒凉景象，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。一片盐碱滩，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夏天水汪汪，冬天白茫茫。”从外边到农场，没有路，要从永宁李俊到邵岗，然后脱掉鞋，淌水才能到连湖。这里只有十几间破旧的房子，算是场部的办公室和库房，没有一间宿舍。我在距场部1公里外的老乡家租了间小土屋。晚上就在土台子上点一盏煤油灯，一边轰赶蚊虫，一边整理资料，常常一干就是大半夜。

对于新建的连湖农场来说，盐碱滩上种水稻，芦草除是最大的课题。上大学时，我学的是小麦和棉花的栽培技术，对于水稻的生长规律，尤其对芦草湖里和盐碱滩上种水稻了解甚少。为了铲除芦草，只有拜师学艺，四处专访，请教当地老农，总结前人的经验。终于钻研出一套通过耕作措施灭除芦草的方法。1957年，连湖农场田间芦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

到农场工作，再就没有在王太堡科研单位的星期天、节假日概念了。虽然条件很艰苦，可那时的想法比较简单，就是有机会一试身手，

把自己学到的农业技术与生产实际相结合。通过实践来检验，改变眼前农场荒凉的现状，以实现报效国家和人民的抱负。

从1954年建场到1989年退休，我是一步也没离开过连湖。35年在连湖农场，我和同事们经过实践，提出了改土治碱、培肥地力、种稻洗碱、科学轮作、暗沟排水、淤洪压碱、整治地条、缩小灌面、挖沟填渠、桔秆还田等实用有效的农业技术和措施，把连湖的荒碱滩改造成了土质肥沃、高产稳产的万亩良田。

搞科研最怕的是分心，但人生总是充满着不确定，注定要尝遍酸甜苦辣。我结婚娶的是河南老家的姑娘，叫刘俊峰。我们两家离得不远，有六七里地。她中学毕业以后，我把她接到连湖，她又上了宁夏技校。毕业后，就在连湖当文书、化验员。两人结婚后感情很好，然而甜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就有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折腾得家里阴云密布。1957年反右，我被列入逮捕名单，“四清”运动被洗得“滚水漂”，进行批斗。再到后来成了“群专”对象，下放到生产队劳动。所有这些，使本性善良又胆小的老伴一次次受到惊吓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再加上老伴母亲在这节骨眼上去世，考虑到当时情景，怕她承受不起这双重打击，便对她隐瞒了此事。孩子又小，我又忙，没有时间送她出远门，只是给家里寄些钱。后来她知道了，觉得自己不孝，对不起母亲，导致老伴病情加重。经北京一家医院确诊为“妄想型迫害狂”，属精神分裂症之一。先后在区内外多家医院求治。这样一来，家庭重担就落在了我一人身上，当时有多难是可以想象的。上班忙工作，回家照顾老伴和年幼的孩子。

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自己的专业知识、科研成果和踏实的工作态度，农场职工群众都看在眼里，觉得一个知识分子，能像老农一样和职工群众打成一片，就很不简单了。掌握农场每一块地情况，挨斗也没有放松抓生产。所以每次批斗，都有职工群众的保护和一些领导的暗中关照。

（吴金邀 马晓虎 整理）

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 
——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(六)

张奎：原来银川师范有两个工人有以前做过点泥瓦匠活，砌墙、打地基都是他们带着我们干，在上房梁时我们几个学物理的有了施展的机会，又逞了一次能，因为上房梁、装门窗都用得着力学原理，指挥劳动的两个泥瓦匠还说这帮碎娃子能得很。开始听不懂，感觉他们是在骂人，后来才知道是在用方言夸赞我们。

宁夏大学是1958年9月15日成立，比自治区成立早了一个月，关键原因是新生已经到校。最早的宁夏大学由宁夏师范学院、宁夏医学院、农学院组成，师范学院开设有中文、历史、理数三个专业，三个学院的学生加起来也只有300来人，是借用老银川师范的几所教室办学。

1960年后新校址才逐步建成。刚开学时学校就分配给张奎一项比带课还难的特别任务，让他去北京采购图书、教具、实验器具，还要再挖些有经验的老教师。派他去的原因是领导知道他在北师大时比较活跃，人缘好、家又在北京，可以省去些住宿费用。在之前的建校劳动中他比较“日能”，给老校长刘继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能者多劳也在情理之中。

张奎：到北京采购图书、教具和挖老师的等工作完成得不漂亮。那时候全国都在大跃进，新建的大学很多，有的省一下子冒出来好几所大学，还有很多地方办了工人大学、农民大学、劳动大学，所有的图书都十分紧缺，特别是专业性的课外读物很难找到。只能委托北师大图书馆和熟悉的老师帮着办，去的时候带了六万块钱，这在当时可真的是笔巨款，图书方面主要是找不到，教学和实验器材主要是没